

中国古代散文研究

孙以昭 陶新民 主编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孙以昭,陶新明主编,—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3
ISBN 7-81052-420-8

I. 中... II. ①孙...②陶... III. 古典散文—文学
研究—中国 IV. I20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5750 号

中国古代散文研究

孙以昭 陶新民 主编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印刷	中国科技大学印刷厂
联系电话	总编室 0551-5107719 发行部 0551-5107784	照排	合肥科应技术公司照排分公司
电子信箱	ahdxchps@mail.hf.ah.cn	开本	850×1168 1/32
责任编辑	高兴	印张	9.125
封面设计	孟献辉	字数	230千
		版次	2001年4月第1版
		印次	2001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7-81052-420-8/I·40

定价 14.8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前 言

散文是文化的主要载体,要了解与研究我国悠久而丰厚的传统文化,就不能不了解与研究我国的古代散文。

我国古代散文产生很早,它随着比较成熟的文字——甲骨文的产生而产生。在这绵长的三千余年中,古代散文随着文化的演进与时代的发展,也经历了漫长的演进发展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作家与作品,取得了无比丰硕的成果,有着极其辉煌的成就。且不说春秋战国诸子散文、两汉史传散文和唐宋的韩、柳、欧、苏古文这些古代散文史上的诸高峰,只就一般认为新意不多的明代三袁“公安派”和过于注重形式的清代“桐城派”而言,其特色、其文理,也粲然可观。

第三届中国古代散文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9年8月在安徽大学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就中国古代散文的一系列问题,如散文史、断代散文、作家作品、散文流派、散文文体、研究方法思路等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

我们受古代散文学会领导诸公的委托,编辑了这次研讨会的学术论文集《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以适应海内外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热潮这一发展趋势,以展示我们学会的研究成果,以建立广泛的国内国际合作关系。

这本论文集的出版得到安徽大学“211”工程“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哲学”项目经费的资助,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限于水平与条件,编辑不周之处,广大读者、专家惠予指正,匡其不逮,是所企盼。

孙以昭 陶新民

2000年8月20日

目次

前言	(1)
读书不多,以讹传讹(郭预衡)	(1)
先秦文体分类与古代文章分类学(赵奎夫)	(3)
古代散文发展规律浅探(章明寿)	(16)
略论古代散文的文体分类(谌东彪)	(23)
中国古代散文动态美的张力分析(尹砥廷)	(30)
略论《尚书》的整理与研究(王世舜)	(39)
从《史记》考孔子作《春秋》	
——四证孔子作“春秋传”(姚曼波)	(53)
夫子“与点”之叹,乃退隐之叹	
——论《侍坐》章所表现的孔子人生态度(陈义成)	(78)
汉代散文二题(韩兆琦)	(88)
论项羽之勇	
——读《史记·项羽本纪》(叶华)	(97)
论邨下文人集团的散文创作(吴小林 袁新文)	(109)
独抒性灵的曹丕散文(谭家健)	(122)
骈文与中国文化精神(孙以昭 许圣)	(137)
南朝美文的衍化(曹虹)	(158)
唐代文章论略说(张伯伟)	(166)
司空图文系年补正举隅(陈道贵)	(180)
论唐宋散文的特质(刘衍)	(188)

从《宋文鉴》的编选看有关北宋散文繁荣的若干问题(洪本健) …	
.....	(199)
日本欧阳修散文研究简介[南开大学(日)须藤健太郎].....	(209)
从李贽、三袁到张岱(胡冠莹)	(222)
金圣叹的《才子古文》和他的散文创作论(江巨荣).....	(222)
屈大均散文对桐城派的影响(何天杰).....	(222)
王思任序文说(俞晓红).....	(228)
八股文研究中两个争论较大的问题(田启霖).....	(237)
魏源的散文理论(李家骥).....	(243)
20 世纪《文选》研究述略(张连科)	(270)

编者按 郭预衡先生以十数载之心力，殚精竭虑，著成《中国散文史》三巨册。上卷甫架，即获文坛青睐；全书问世，学林月旦佳甚，因从中具见先生治史之思想、为学之特色，与夫严谨之学风。然先生犹不自愜，于下卷《后记》中云：“天下之书，实未遍读；习见之书，也未尽读。虽未敢‘妄下雌黄’，也不免信口雌黄。”今又作是文，以一人名沿用史传旧称未作深究自咎。夫书之难尽读，史事之难胜考也，乃先生谦抑如此，从严责己，足征先生之学品人品，诚大家之风范、学者之楷模也。于商品经济发达、文人雅士不甚注重道德、文风之今日，尤为难能可贵，弥足称道。因赘数言，用志景仰。

读书不多，以讹传讹

郭预衡

当拙著《中国散文史》下卷付印之际，我写了一篇《后记》。写这篇《后记》的动机，主要是例行表示对于出版社编辑先生的感激，同时也说到自己写完这三卷书，并非“踌躇满志”，应读之书尚未尽读，虽读也未尽懂，如此等等。

有的朋友看了之后，说我过于谦虚。谦虚固好，过于谦虚，就不大好。

当我正在不知如何是好之时，孙以昭先生给我打来电话，他正在编辑上届散文学会的论文集，要我也写一篇文字，而且提到那篇《后记》。我于是受到启发，觉得这倒是个机会：此刻虽然写不出论文，却可借此补写一点自己读书不多、并非谦虚的实例。

在《中国散文史》下卷论述明初几个作者时，我列举了一个“王祎”。此人与宋濂同时，甚有时誉。因为死于使事，《明史》将他列入《忠义传》里。《忠义传》之外，《明史》的《文苑传》、《艺文志》以及《元史》所附李善长《进元史表》和宋濂《目录后记》中，都有“王祎”的名字。

但这个名字是错的。“祎”当作“衞”，从“衣”，不从“示”。这是一位青年朋友徐君永明看了我的失误之后写信给我纠正的。他正在撰写《王衞年谱》，其详于谱主的生平事迹，自然非我所能企及。他根据宋濂的一篇《送王子充字序》，指出“衞”当作“衞”。宋濂与王衞为同门之友，这篇文章专门讲王衞取名的意义，这是最可信据的。

宋濂的文章，我读过不少，但没有尽读。有的文章只读几行，不见精彩，便一掠而过。《送王子充字序》就是觉得没有多大意思而未细读的一篇。却不料正是这篇文章可以纠正“王祎”之名以讹传讹的失误。

评述一个作者，连名字都写错读错，以讹传讹，除了自恨读书不多，更复何说！

先秦文体分类与古代 文章分类学

赵逵夫

先秦散文历来为学者们所重视,对后代文章影响甚大。从研究方面说,把专从哲学、政治、历史等社会科学方面研究的论著抛开不说,只解读、评析方面的论著也是汗牛充栋。可以说历来有关先秦诸子、先秦史传方面的论著都是有关先秦散文的。但先秦散文的研究还有待拓宽领域和进一步深化。我认为应从五个方面入手:其一,文献学方面的研究(包括地下出土先秦文献及由之引起的对先秦散文的真伪、创作时代的重新审视,篇章的分合,作者的归属,文献学的处理等);其二,断代的研究(如对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散文的状况分别加以研究);其三,文体学研究;其四,地域特征的研究(如中原、齐鲁、南楚、秦地等地文章的文风特征等);其五,流派研究(先秦诸子的文风表现出各自独特的风格,故儒、道、墨、法等不仅是思想的流派,也是散文的流派)。其他问题暂且不谈,这里说说先秦时代的文体分类与当时人们对文体的认识,顺便谈谈我国古代的文章分类学。

一个民族的各种文章(包括应用文和文学作品),不仅其内容反映了该民族的历史、文化,其形式也带有民族的特征。文体是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反映着一个社会的文化状况。但每一个时代的文体都是由过去的文体发展演变而来的,有变革,也有继承。建立科学的文体学,提出能反映我国文体实际、又具有现代科学性

的文体分类办法,既要当前的文体发展情况有全面、深入的了解,也要对国外文章分类方面的研究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同时还得弄清我国古代文章分类的发展过程和有关理论。这些工作不走在前面,就很难有实质性的突破与建树。

关于古代文体分类,近十多年已有研究的论著问世,如褚斌杰先生的《中国古代文体概论》。

文章不同形式、不同体裁的形成,是很早的。文字产生以前已有祭祀,有氏族、部落的会议,氏族、部落的首领常常发布命令,或就某些事情作训告,于是祷辞和训告、命令等语言形式便产生了。与此同时,神话故事、传说、歌谣,作为早期自然科学知识结晶和社会礼俗成规的谚语也都产生了。这些言辞因为使用场合与使用对象的不同,从形式到语言风格上都会有所不同,这便形成了不同的“文体”,只是,因为它们不是用文字固定下来的,还不能算是文章。其形式也只能说是约定俗成的表述方式,还不能说是“文体”。它们除歌、谣、谚以及韵文形式的祭祷之辞(如传为伊耆氏的《蜡辞》),可能由长期的口耳相传,至文字产生之后被著之竹帛,其他的便湮没或慢慢变形,甚至加进了后代的东西(属于后一种情况的如《尚书·尧典》)。虽然由口头语言到最早的书面语,其间被删除的必然很多,但后来的所谓“文章”便是从这里产生的。随着人们创造的文字数目的增多、文字对语言的记录功能的增强,各种文章便产生了,各种文体也随之产生了。

我国古代关于文体的认识也是很早的。《尚书》中不少文章的篇名,实际上是在文体名前面加了作者的名号(也有的只以作者名号为题,个别的取篇中几字为题,乃后人所拟)。这同《尚书》这部书取名的情形是一致的。《尚书》中的文体名称有“典”、“谟”、“誓”、“诰”、“训”、“命”^①。又《国语·鲁语》云:“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颂”是相对于民歌(“风”)和贵族、文人的一般抒情、讽刺之作(“雅”)而言的,不仅在内容上,而

且在形式上也有其特征。由《国语》中这一段话可以看出，在商代已将这些体裁相同的作品集结起来并名之为“颂”。《逸周书》、《左氏春秋》、《国语》、《战国策》等书中，也存有不少先秦时不同体裁的文章，宋代陈骙的《文则》总结《左氏春秋》中的文体有八种：

考诸《左氏》，摘其英华，别为八体，各系本文：一曰“命”，婉而当（《尚书》有命十八篇）。二曰“誓”，谨而严（《尚书》有誓八篇）。三曰“盟”，约而信。四曰“诤”，切而悉（《尚书·武成》有武王伐纣诤辞，自“惟有道曾孙周王发”至“无作神羞”，是其文也）。五曰“谏”，和而直。六曰“让”，辩而正。七曰“书”，达而法。八曰“对”，美而教。

下面又一一举出见于《左氏春秋》的例子，实际上还可以补出一些。诗、歌、谣、诵这些文学体裁不算，任昉（460～508）《文章缘起·序》中指出的鲁哀公《孔子谏》（哀公十六年），属于前人常常说到、《文心雕龙》中专篇论述的谏体；《虞人箴》（襄公四年）和见子昭公七年的正考父《鼎铭》属于“箴铭体”；《文心雕龙·檄移》指出，管仲之对楚人（僖公四年）、吕相的绝秦书（成公十三年）属檄移体。再如子鱼论战（僖公二十二年）、晏子之论和同（昭公二十年）、子产之论尹何为邑（襄公三十一年），属于论辩体；王子朝告诸侯（昭公二十六年），襄子诏令体，则见于《左氏春秋》者至少有十多种文体。明人吴讷《文章辨体》在论及“谕告”、“论谏”、“书”、“序”、“铭”、“诔”各文体时，徐师曾《文体明辨》在论述“命”、“盟”、“书记”、“论”、“序”、“文”、“杂著”、“箴”、“铭”、“祝文”时，也多录有先秦文章为例。清人姚鼐编《古文辞类纂》，按照他自己作文的“义法”，先秦散文中“奏议类”选《战国策》6篇、李斯文2篇，“书说类”选《战国策》38篇，“诏令类”选秦始皇1篇，“碑传类”选李斯刻石文6篇，“辞赋类”除屈、宋之作外，并录入《战国策》中的《楚人以弑说顷襄王》、《庄辛说襄王》，只是不及《尚书》、《左氏春秋》、《国语》和诸子之书。与上面所说的诸书合而观之，可大略看出先秦时代文体发展的

情况。

我国古代关于文体的认识和归纳概括，也是比较早的。《周礼·春官·大祝》中说：

作六辞以通上下、亲属、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谏。

这“六辞”的作用是为了“通上下、亲属、远近”，故显然只包括应用文，其他文体如诗歌、春秋（史书）、卜辞等则不在其内。按照东汉郑玄的解释，“六辞皆为生人作辞，无为死者之事”^②。也就是说，大祝所掌此“六辞”，都是用于现实政治生活中上下远近的诸多关系之间，至于祭神鬼、人祇的文字，则在“六祈”的范围。《大祝》篇在上引文字前云：“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掌六祈以同鬼神示”。《周礼》原文对“六祝”、“六祈”的具体名目也有说明。《文心雕龙·祝盟》云：

及周之大祝，掌六祝之辞，是以“庶物咸生”，陈于天地之郊；“旁作穆穆”，唱于《迎日》之拜；“夙兴夜处”，言于祔庙之祝；“多福无疆”，布于少牢之饔；宜社类祸，莫不有文。

则刘勰是以“六祝”为六种文体。三代以前，事鬼神，重祭祀，故有关祭礼的仪式、文体分得很细。我们将此“六祝”、“六祈”各归并为一，都只看作一种文体，则《周礼·大祝》也应是归纳出了八种文体。这八种文体为大祝所掌，只是周代朝廷应用文的一部分。应该说，这种概括还是比较全面的。

《左氏春秋·襄公十九年》载，鲁国将同齐国作战所获兵器铸为无射之钟，上面刻了铭文，臧武仲（臧纥）因此有一段论“铭”的文字，可以说是对“铭”这种文体的最早的专论：

夫铭，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今称伐，则下等也；计功，则借人也；言时，则妨民多矣，何以为铭？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铭其功烈，以示子孙，昭

明法而愆无礼也。

这里对铭的内容、功用作了阐述。认为铭在天子只能是“令德”（“令”为动词，意即表彰），在诸侯只能是“言时计功”，不能将不义的行为、事件也作为铭的内容。自然，臧武仲这段论述体现了一定的阶级立场，但也提出了文章内容的真实性和社会教育作用的问题。

如果说臧武仲这段文字尚嫌简略，那么，《礼记·祭统》中有一段论铭的文字，则不仅论及内容的问题，也还论及形式方面的问题：

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昭著于后世者也……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勤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身比焉，顺也。昭示后世，教也。夫铭者，壹称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观于铭也，既美其所称，又美其所为。为之者，明足以见之，仁足以与之，可谓贤矣。贤而勿伐，可谓恭矣。

其文后又录了春秋时卫国孔悝的《鼎铭》全文，并加以评论。文中所说“铭者，自名也”几句，即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所提出论述文体的四原则中的“释名以章义”；举出孔悝的《鼎铭》，即刘勰提出的四原则中的“选文以定篇”；范文之前、之后的议论，即“敷理以举统”。刘勰还提出一个“原始以表末”，这里没有体现，因为这段文字本来就已是论铭这种文体内容、体例的早期文献。后人论铭，则当溯于此，溯于孔悝《鼎铭》等早期作品。文中所说的“身比焉”，谓“自署名于下”（郑玄注），即属于格式方面的内容。

以上所引述还不是完全从文体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它们只能说是文体学的滥觞。涓涓之流，千折百合，至东汉蔡邕《独断》，将天子下于群臣之文分为四类：策书、制书、诏书、戒书。将群臣上于天子者也分为四类：章、奏、表、驳议。共八种朝廷应用文体（另有

“宗庙乐歌”一类,此处未计在内)。还有他的《铭论》,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文体论。曹丕《典论·论文》、桓范《世要论》、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又各有所发展。至任昉《文章缘起》、刘勰《文心雕龙》,则对以前文体学研究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与新的推进^①。萧统的《文选》则是当时文体分类理论的一种实践。

上面主要是说,在我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了一些文体,古人对文体特征的认识与概括也比较早,而且在魏晋时代已形成文体学专著,到南北朝时代已在文体研究方面产生了很有理论水平的著作,并且提出了论述文体划分的规范。

但是,一个时代的文体,同该时代的政治、社会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不仅同一文体在不同时代,其形式、语言风格上会有所不同,而且各种文体所占的主次地位也有变化,甚至于有的文体慢慢会没有人使用,而又产生出新的文体。但消失了的文体,也不是完全消失了,它的某些特征也可能体现在新文体之中;新生的文体,也非完全是新的,大多是吸收了旧有文体的部分特征,其因革流变的关系十分复杂。由于一些作者写作中的创造性,也有用此法写彼、以彼法写此,以彼为此、以此为彼的情况。可以说,文体时时处于变化之中,各种文体间的关系也是时时处于变化之中。

由于这些原因,对文章的分类总是见仁见智,看法不一。文章学的发展也十分缓慢,而且分类一直繁杂琐细,缺乏比较科学的归纳。如萧统《文选》分文体为 39 种,而宋元之际陈仁子编《文选补遗》则为 37 种,南宋王霆震《古文集成前集》分为 20 种(此将河图洛书、八卦、图为一类计),但显然有遗漏,比如其中下对上之文体有书、表、劄、封事、疏、状、议等,上对下的策诏之类却一种也未列。明初庆王朱栴编集的《文章类选》四十卷,按文体分为 58 类(不收诗而收赋、骚、辞、曲操、乐章,并各为一类)。到明中叶的吴讷撰《文章辨体》,虽仍分为 58 种,但包括各体诗,其他也稍有归并、增

损。稍后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则增为120种，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七百八十卷，更分文体为132种。明人对文体之条分缕析，此其极矣。

我国古代在很长时间里对文体划分中文章的用途、使用场合、使用对象考虑较多，即孔颖达所谓“致言有本，名随其事”。而对文体本身的特征考虑较少，缺乏对文体特征的概括性认识。

将古今所有的文体一一列出，是不可能的。文体具有时代性，已死的和现存的并列一起，也不利于对文体发展的认识，而且古今文体之间还有同体异名、同名异体等等复杂的情况。

那么，有没有一个办法将古今文体一并加以划分，以显示其类别的特征，而又可以避免繁琐与混乱的情况？

这里自然就提出一个问题：把文体类别划分得大一些成不成？但另一方面又得考虑：如将古今的文体归为几个大类，这大类是不是还可以看作文体分类，它能不能说明一种文体的特征及其流变。

从上面两个方面考虑，对文体作分级划分，似乎是一种可取的办法。

事实上，在古代一些学者的论著中，已经无意识地表现出这样的一种认识。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备其体。

举出八种文体，而每两体联称，归为四科，各用一个字来概括其文体方面的特征。此似可以看作二分法的滥觞（前两科四体为无韵之文，后两科四体为有韵之文，似其中也隐含有文笔之辨）。如果将它同稍后的陆机的《文赋》结合起来看，就更清楚了。《文赋》说：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触辞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烨而谑狂。

分别论述了十种文体的特征,也是两句为一组,成“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与曹丕所说有所不同,但同样朦胧地体现出对文体相近者加以归类的思想。

在作品编集中采用二分法的,如果追本溯源,最早应是《诗经》一书。《诗经》将所有作品按“风”(民歌,也包括一些上层人士的歌词);“雅”(用雅言所写,基本上为严整的四言诗,极少有重章叠句的情况);“颂”(宗庙乐歌,因其配合歌舞,故一般比较短,有一些不太讲究句式的整饬)分类。但“风”之中又按地域不同(唱的声调自然也不同)分为十五国风;“雅”又分为“小雅”、“大雅”;“颂”又分为“周颂”、“鲁颂”、“商颂”。其较细的一级划分不完全是从形式上来考虑,而主要是以作品产生的地域、朝代,或收集的先后为原则划分的^④。所以,这还不能说是文体上的二分法。不过,如果我们将“诗”同“赋”、“诔”等文体并列起来看,“诗”已经是一种独立的文体,也就是说,它已经经过分类了。那么,它下面的“风”、“雅”、“颂”则应看作二级分类。乐府(民歌)、四言诗、颂,这在南北朝以后也一直作为文体看待,而这里都归入“诗”一类,反映了编《诗经》者在这一点上比后来很多文体专家还高明一些。只是由于《诗经》是独立的一部书,人们忽略了它在文体分类上的启示意义。

萧统《文选》在编排上采用了二级分类的办法,但它在各文体之下是按内容、题材来划分的。北宋姚铉(968~1020)编的《唐文粹》也采取这种办法,但其中“表奏书疏类”分表、书奏、疏、状四目,则是文体二分法。该书分文体为23类,其中22类是《文选》的老办法,惟“表奏书疏类”大概因为按内容题材不好再细分,故如此处理,没想到歪打正着,倒显示了文体分类上的一种新的方向。

真正在文体分类上采取了二分法,而且做得比较好的是南宋时代的真德秀(1178~1235)。他的《文章正宗》将文体分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目,每一目下再分体。其自序云:

正宗云者,以后世文词之多变,欲学者识其源流之正

也。自昔集录文章者众矣，若杜预、挚虞诸家，往往湮没弗传。今行于世者，惟梁《昭明文选》、姚铉《文粹》而已。由今观之，二书所录果得源流之正乎……故今所辑，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其体本乎古，而指近乎经者，然后取焉。否则，辞虽工亦不录。其目凡四：曰辞命，曰议论，曰叙事，曰诗赋。

这是我国文体分类上的一个很大的进步，具有开创的意义。他立为四目，也可能受到曹丕《典论·论文》的启发，但主要应是他个人创造性思维的结果，因为像“议论”、“叙事”这样的完全从形式和反映生活的方式上高度概括的划分，此前确实还没有过。当然，真德秀的道学思想太重，他认为后世文章有脱离正统的情况，才要标举“正宗”。但我们不论其选文标准，只从文体学方面说，这确是一个贡献。比真德秀稍迟的严羽在其《沧浪诗话·诗体》中对诗歌各体按不同标准，从各个方面进行分类。诗歌分类，从理论上说对散文的分类也有借鉴作用。但该书有的地方在同一类中的划分不够严密，有任意罗列的毛病。明代冯班《严氏料谬》说：“沧浪一生学问最得意处，是分诸体制。观其《诗体》一篇，于诸家体制浑然不知。”批评是很厉害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古人对文章体制问题很重视。比较而言，真德秀在文体分类学上的贡献是突出的。

由于文体的划分标准不是单一的，所以，在真德秀之后，又有人从另外的角度进行分类的尝试。

清代储欣的《唐宋十大家类选》分文章为6大类：奏疏类、论著类、书状类、序记类、传志类、词章类。每类又分为若干目。比较起来，这种分类法对以前的文体分类考虑较多，是在传统文体分类基础上的进一步概括。

此后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分文章为13类：论辩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颂赞类、辞赋类、哀祭类，比储欣分得稍细一点，但比起明代《文章类

选》、《文章辨体》、《文体明辨》、《文章辨体汇选》等的分类要概括得多。虽然仍是在传统分类基础上的归并，却反映出了一级分类在一些学者的二级分类的影响下向二级分类类别靠拢的情况。清末吴曾祺编《涵芬楼古今文钞》，便采取了姚鼐的十三类分法，却在每一类下面又分为若干体。

对二级分类进行探索而走出了新路的，是作为桐城派支脉与后翼的李兆洛、曾国藩。阳湖派作家李兆洛的《骈体文钞》，就骈文而言分为三大类、32种：

其一，庙堂之制、进奏之篇（包括铭刻、颂等19种）；

其二，指示述意之作（包括书、论、序等8种）；

其三，缘情托兴之作（包括设辞、七、连珠等5种）。

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也分为三大类，称作“门”，每一门中再分类：

一、著述门，包括3类：

1. 论著类（论著之无韵者）；

2. 词赋类（著作之有韵者）；

3. 序跋类（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者）。

二、告语门，包括4类：

1. 诏令类（上告下者）；

2. 奏议类（下告上者）；

3. 书牋类（同辈相告者）；

4. 哀祭类（人告于鬼神者）。

三、记载门，包括4类：

1. 传志（所以记人者）；

2. 叙记（所以记事者）；

3. 典志（所以记政典者）；

4. 杂记（所以记杂事者）。

这个划分比以前各种分类方法都清楚，逻辑上也比较严密。